

Buddhism under the T'ang

唐代佛教

[美] 斯坦利·威斯坦因 著
张煜 译

剑桥中华文史丛刊

[英] 杜希德 主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剑桥中华文史丛刊 [英] 杜希德 主编

Buddhism under the T'ang

唐代佛教

[美] 斯坦利·威斯坦因 著
张煜 译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代佛教/(美)斯坦利·威斯坦因著;张煜译.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8

(剑桥中华文史丛刊)

ISBN 978-7-5325-5570-3

I. ①唐... II. ①斯...②张... III. ①佛教史—研究—中国—唐代 IV. ①B94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61988号

剑桥中华文史丛刊

唐代佛教

[美]斯坦利·威斯坦因 著

张煜 译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邮政编码200020)

(1)网址:www.guji.com.cn

(2)E-mail:guji@guji.com.cn

(3)易文网网址:www.ewen.cc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经销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14.75 插页 5 字数 210,000

2010年8月第1版 2010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300

ISBN 978-7-5325-5570-3

K·1285 定价:40.00元

如发生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献 辞

怀着尊敬与感激之情

谨以此书怀念

保参玉泉教授（1887—1964）与增永灵凤教授（1902—1981）

“一句的思也必须要感谢。”

——道元禅师《正法眼藏·行持》

杜希德与二十世纪欧美汉学的 “典范大转移”

——《剑桥中华文史丛刊》中文版缘起说明

陈 珏*

—

“汉学”研究的主流，在二次大战前后，出现了一场从欧洲为代表的“典范”，到美国为代表的“典范”的大转移(paradigm shift)^①。

近三十年前，杜希德(Denis C. Twitchett, 1925—2006)先生应邀从英国到美国，由剑桥大学汉学讲座教授，转任普林斯顿大学“胡应湘汉学”讲座教授。从学术史的角度看，这在二十世纪欧美汉学的波澜壮阔的“典范大转移”的过程中，是一件相当重要的事情^②。

然而，这样一位宗师级人物的其人其书其贡献，长久以来，在中文世界里，却鲜为人知。这一方面是由于杜公为人十分清高，十分低调，不事张扬；另一方面，也是由于错综复杂的西方汉学的学术史，在中文世界中至今还仍然是一门十分年轻的学问，刚刚才起步。然无论如何，这都不能不是一件令人十分遗憾的事情。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像不了解费正清，就无法全面了解二十世纪欧美汉学的“典范大转移”的诸种重要面相一样，不了解杜公，人们对上述“典范大转移”的了解，也会打上一个相当大的折扣。

* 作者系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台湾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暨历史研究所教授。

正为如此,我有感而发,在2006年1月14日香港《文汇报》副刊上,以《不该忘却的杜希德》为题,写了如下一篇短文,对杜公沟通英美学界,在二十世纪后半叶,促成汉学典范转移的三大里程碑式的“名山”事业,略作简述^③:

世纪交接的时候,《华声报》评出“影响中国20世纪的百位外国人”,有外交官、作家、实业家、汉学家和政客等等,很有参考的价值,然而这个名单也有可讨论的地方。就美国汉学家而言,已故的哈佛大学的近现代中国研究的鼻祖费正清(John Fairbank)和耶鲁大学研究中古文明的芮沃寿(Arthur Wright)均在其列。如果这两位够资格,也许不应该漏掉目前尚健在的杜希德(Denis Twitchett)。

杜希德是二十世纪后半叶西方公认的唐史学界和中国通史学界的领军人物,一代宗师,其自订汉名原为杜希德,但因其在中文世界中(包括港、台、新、马),久以崔瑞德名世,他本人亦只好采默认态度。杜氏历任英国剑桥大学第六任汉学讲座教授(首任为英国近代汉学鼻祖、晚清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胡应湘汉学讲座教授,除了在国际唐史研究中多划时代的贡献外,一生最重要的领导二十世纪后半叶汉学研究学术潮流的成绩主要有三个方面。

其一,与费正清合作共同主编15卷本的《剑桥中国史》(*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杜氏负责大部分,为第一总主编,费氏负责小部分,为第二总主编。这套里程碑式的英语学术性中国通史,与其他各种“剑桥史”一样,其要求十分严格,数十年而磨一剑,至今尚在继续出版中。

其二,在二次大战后接编“原籍”德国的欧洲汉学名刊《泰东》(*Asia Major*),该刊后又随杜氏迁往美国普林斯顿,直至九十年代中期杜氏退休为止。《泰东》在二次大战前与法国的《通报》(*T'oung Pao*)同为欧洲最重要的两大汉学学报,在杜氏手中变得更加多姿多彩,甚至在其退休后,该刊编辑部转到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改主编制为编委会制,仍由杜氏任首席编委,现在依然不失为国际汉

学界顶尖学报之一。

其三,近四分之一世纪以来,为剑桥大学出版社主编 *Cambridge Studies in Chinese History, Literature and Institutions* 丛书,其中文直译虽为《剑桥中国历史、文学与制度研究》丛书,但杜氏为其确定的丛书汉名是《剑桥中华文史丛刊》,由海外名书法家张充和题写,冠于每卷的卷首,经过数十年连续推出重要研究成果,在汉学界的影响深远,已经成为一种经典。不少今天英、美汉学界的重镇,当年均曾经受杜氏识拔,将其成名专著收入该丛刊首先出版。这些今天的汉学界成名人物包括英国剑桥大学现任汉学讲座教授麦大维(David MacMullen)、美国耶鲁大学教授 Stanley Weinstein、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主任 Robert Hymes、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讲座教授 Nicola Di Cosmo、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王汎森(英国皇家学会会士和台湾中研院院士),以及已故的华裔美籍学者黄仁宇(黄氏当年以一部《万历十五年》赢得国内读者青睐,从此其书畅销不已,而在其身后出版的长篇回忆录《黄河青山》中有对杜氏的知遇之恩的详细记载)等。他们当年初出茅庐的首部专著,都是通过收入《剑桥中华文史丛刊》而一举成名。

杜氏现隐居剑桥,不见外客,但继续在主编《剑桥中国史》,而前来拜访的门生故旧仍络绎不绝。

文章刊出,我当时正远在新西兰任教,当收到样报,已是次月上旬,即航邮一份到剑桥,没想到约两个星期后,忽然传来杜公2月24日因心脏病发、与世长辞的消息。人生之无常,大树之飘零,令人感慨无已。所幸者,杜公所留下的上述三大里程碑式的贡献,却将长久作为历史的见证,与二十世纪的汉学同在。

对中文世界的读者而言,在杜公以上的三大遗产中,除了《剑桥中国史》外,《泰东》学报与《剑桥中华文史丛刊》两者,可以说至今仍“养在深闺”,鲜为人识,尤以《剑桥中华文史丛刊》需要特别提出。该丛刊三十年来,已出版约有五十部之多的专书,在西方名闻遐迩,中文世界中却极少

有人知道它的来龙去脉^④。十多年前,我在普林斯顿求学期间,曾经向杜公建议,是否应该考虑出版一套中文的精选版?他当时没有在意。后来在2005年,再次谈起此事时,杜公便命我代他与上海古籍出版社联络相关事宜。众所周知,如今经济大潮中的学术出版,实属非易,然而上海古籍出版社目光远大,很快就签订了合同。于是,由杜公本人任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副社长、副总编辑高克勤兄和我协助任执行主编的《剑桥中华文史丛刊》中文版工程,就开始启动。

近日接到出版社电邮,称《剑桥中华文史丛刊》中文版在明年一月开始,就要陆续与读者见面了,让我写一篇“缘起说明”。时光如白驹过隙,转眼明年二月已是杜公逝世四周年了,令人感慨无已。

这篇文章,本来想从当年协助杜公筹备中文版的所见所闻出发,结合我目前正在进行的汉学学术史的研究计划,比较全面介绍这套丛书在二十世纪欧美汉学的“典范大转移”中的地位与作用,然如此一来,便要写成数万言的论文,决非一篇“缘起说明”的篇幅,所能包括^⑤。因此,这里只好先在总体上对杜公与欧美汉学的“典范大转移”的关涉略作简述,然后再集中笔墨,就他如何三十年如一日,通过编辑《剑桥中华文史丛刊》,为推动上述“典范大转移”的完成,培养大量杰出学术人才所花费的心力,举几个例子。换言之,此处只是以龙鳞豹斑,稍窥全貌,与读者分享。挂一漏万,在所难免,尚祈谅解。

二

要讨论杜公与二十世纪欧美汉学“典范大转移”的关涉,需先对汉学的历史,作一个简单的回顾。

“汉学”作为一门学科,始于何时?有“十三世纪”说,有“十六世纪”说,也有“十八世纪”说或“十九世纪”说,聚讼纷纭,莫衷一是^⑥。

然而,时至十九世纪末叶,西方诸国始有大学汉学讲席之设立,并开始有权威性专业学报之出版,则为不争之事实。当时正是“殖民时代”的全盛时期,汉学讲席与汉学学报,全在欧洲,至于北美与澳洲之后续跟进,

则主要是二十世纪的事情了。以大学讲席而言,1814年法兰西学院设立汉学讲座,1875年荷兰莱顿大学设立汉学讲座,1875年英国牛津大学设立汉学讲座,1888年英国剑桥大学设立汉学讲座,形成了规模。以学报而言,1889年法国高第(Henri Cordier, 1849—1925)与荷兰施古德(Gustaaf Schlegel, 1840—1903)共同创办的《通报》,出版至今,仍是领域内的权威学报。

换言之,通过以上的种种,汉学研究的格局,十九世纪末,已经在欧洲跨国形成。在当时的大学体制中,汉学是“东方学”(Oriental Studies)的分支,与“古典学”(Classics)等科系为邻,同属于“人文学科”(the Humanities)的一个组成部分。从此出发,到二十世纪初,乃是“汉学”的学门“典范”在欧洲的“形成期”。

这个“形成期”,是通过欧洲内部诸国各自的汉学“小”传统的典范互相激荡与转移,经过一个相当时期的“磨合”与“互补”,而逐步完成的。举例来说,法国有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的以中西交通史为中心的考古与语文考据的传统,德国福兰阁(Otto Franke, 1863—1946)的通史传统,瑞典高本汉的音韵语言学传统,荷兰有施古德的以秘密会社与娼妓史为对象的社会学传统与高延(Jan Jakob Maria de Groot, 1854—1921)的以民间宗教习俗为对象的人类学传统,英国翟理思(Herbert Giles, 1845—1935)的文学史传统等等^⑦。正是由于这些杰出“小”传统的细流汇聚而成江海,形成了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以欧洲为中心的汉学“典范”。

如果用非常粗线条的视野来观察,这种从十九世纪开始在欧洲型塑完成的学门“典范”,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二次大战前,仍然是西方汉学的主流与正宗。换言之,虽然从二十世纪初叶开始,美国的汉学研究,蓬勃崛起,然而要等二次大战以后,它才逐步取代欧洲汉学,得到领导世界汉学发展的主流地位。而这一变化的关键之一,就是所谓二十世纪欧美汉学的“典范大转移”。

二十世纪中叶,从二次大战的胜利到今天,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类的整个知识与学科的结构,也随之发生了改观。在此期间,西方

的主流大学与研究机构,推动了这一场学科的转变。在科技理工领域,一系列原来闻所未闻、想不敢想的新学科,如原子物理、生命科学、电脑工程等,应运而生,把世界疆域的边线,拓展到前所未有的范围。在人文社会领域,种种新主义与新学派,如存在主义(Existentialism)、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新史学(New History)、符号学(Semiotics)等,如雨后春笋,此起彼伏,打破了原有的学科分界线,以跨领域为时尚,重新进行学门与智识的结构整合,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在这样总的历史氛围中,随着时间的推移,整体实力而言,美国的高等教育成了西方的典范,而其代表性的大学成了西方的旗舰,与欧洲的主流大学有了新层面的互动交流。

战后的美国大学在人文社会科学的结构重整过程中,“汉学”摇身一变,从一门主要与“古典学系”等科系为邻的“冷学问”,蜕变为跨学科的“区域研究”(regional studies)中的“中国研究”(Chinese studies)的“热学问”,与历史系、社会学系、政治学系、艺术史系、比较文学系、地理学系、宗教系有复杂交涉,其所跨越的学科,已远远超出了“人文学科”(the Humanities)的范围,而开始进入“社会科学”的更开阔的新领地。“中国研究”的对象关怀,也从以前的“古代”为主,渐渐转到了“古”、“今”并重,甚至“近现代”为主。在这样的背景中,原来作为“东方学”的分支,而与“古典学”科系为邻居的“汉学”,为了适应变化中的大学的新的智识与学科结构,就不能不经历一番“典范”的大转移。

要说到当年发动二十世纪的这场欧美汉学的“典范大转移”的大本营,哈佛自当仁不让,其领军人物,则无疑是费正清。战后费氏从1946年开始到1991年去世,四十五年如一日,以哈佛为基地,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中国研究”的杰出人才,引领学界新风潮。

在此种风潮的影响下,美国的东岸与西岸,以及中西部的重要大学中,出现了若干由一流学者领导的“中国研究”的学术中心。例如,芮沃寿在耶鲁,狄百瑞(William de Bary, 1919—)在哥伦比亚,牟复礼(Frederic Mote, 1922—2005)在普林斯顿,柳无忌(1907—2002)在印第安那,薛爱华(Edward Schafer, 1913—1991)在伯克利,刘若愚(1926—1986)在斯坦福,都从不同的

角度,亲身投入这场“典范”大转移,在各自的领域中,开疆略地,大显身手,并在他们的学生中培养出许多后来的名教授,继续拓展与开掘各个相关领域的深度和广度,型塑“中国研究”的新典范。

“典范”的“转移”,不等于对旧“典范”简单的扬弃,而需要推陈出新,实现创造性的转化。美国费正清等诸公,深明此义,始终不倦,寻求欧洲同行的理解与合作。而在大洋的彼岸,欧洲主流学术机构中的许多汉学名家——如法国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 1894—1979)、荷兰许理和(Erik Zürcher, 1928—2008)、德国傅海波(Herbert Franke, 1914—)等——也深切感到时代在变化中,美国发动的这场“典范大转移”是历史的必然,于是如何与时俱进,互相取长补短,与美国汉学界隔海呼应,共襄盛举,一起完成这一场历史性的“典范大转移”,就成了当年大西洋两岸同行所面临的共同问题:欧洲“汉学”界需要美国“中国研究”的新视野,美国“中国研究”界也需要欧洲“汉学”的传统资源。

在这样的背景下,杜公当年的渡海赴美,就有一定的存“亡”续“绝”、继往开来的学术史意义。杜公在渡海赴美之前,在1960年到1980年间,先为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汉学讲座教授,后任剑桥大学汉学讲座教授,1967年获选为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执英国汉学研究之牛耳,凡二十年之久。学术界视其为战后英国汉学界的扛鼎者与欧洲汉学界的代表人物之一,乃实至名归,毋庸置疑。然而,他在转任普林斯顿之后,将其所携欧洲汉学的无形资源,连同自己学术生命的全盛期,全部贡献给了推动欧美“典范大转移”的功德与事业,却较少为中文世界所知,这里便不能不稍费笔墨,略作钩沉^⑧。

首先是杜公赴美与普林斯顿汉学的关涉。在中文世界里,很多人知道普林斯顿是西方的汉学研究重镇之一,但较少有人注意到普林斯顿的汉学研究的历史其实相当短,是在二次大战结束,牟复礼先生到任以后才开始的,更少有人知道普林斯顿的汉学研究之所以能在短短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取得今天的成绩,在一定程度上乃得之于牟公藉当时汉学“典范大转移”的机缘,筚路蓝缕的开创和始终不倦的推动,其中尤重建设第一流的图书馆与千方百计礼聘第一流名师。很长时期内,普林斯顿葛思德

东方图书馆(Gest Oriental Library)的地位,在全美居于同类专业馆之第三(哈佛燕京居第一,美国国会居第二)。胡适在战后,就曾先后担任馆长和名誉馆长,直至其去世。

当年东亚系草创之时,牟公有一句目标性的名言:五十年以后,研究中国古代的文史,要到普林斯顿来。在费正清的影响下,哈佛当时在中国近现代史领域,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稳居领导地位,如日中天。牟公年轻时,也曾受业从游于哈佛费正清之门,深知此诚不可与之争锋。于是乎,牟公在“典范转移”的大潮中,为普林斯顿设计的蓝图是,以刷新古代文史的研究格局为轴心,贯通欧美、融会中西,努力后来居上,以五十年时间,跃居美国乃至全世界的前列。

一如其所预言,普林斯顿的文史研究果然于上世纪末到达全盛时期,就文学而言,治诗歌与诗学,有高友工先生;治小说与叙事,有浦安迪(Andrew Plaks)先生,在各自相关领域内,与哈佛的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和韩南两先生,同执牛耳十余年。史学则更盛,余英时先生治汉史、杜希德先生治唐史、刘子健先生治宋史、牟复礼先生治明史,遂使美国研究汉、唐、宋、明史的权威云集在一个校园里,真所谓人才集一时之选,而令普林斯顿的断代史研究的大格局,由此奠定,并维持了将近半个世纪。

杜公就是在这样一个特定的时空环境中,来到普林斯顿,以其独有的欧洲汉学背景,与余、刘、牟三位宗匠一起,着手推动中国文史研究的“典范大转移”,花去了差不多整整十五年的时光。

三

如前所述,杜公在推动二十世纪汉学的“典范大转移”过程中,有三大里程碑式的贡献。他与费正清合作主编的十五卷本《剑桥中国史》,作为权威性的“剑桥史”的一种,每一卷每一章约请的撰写人都是欧美相关领域的顶尖专家,代表了当时大西洋两岸的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最高水平,看得出正在潜移默化转移中的“汉学”与“中国研究”的“典范”的天衣无缝的交融。

在同一“典范”的转移过程中,他从英国带到美国的《泰东》,其风格内

容正好与欧洲的《通报》和北美的《哈佛亚洲学报》相互补充。这份重量级的学报，甚至直到这次“大转移”早已完成的今天，仍与《通报》和《哈佛亚洲学报》一起，并列为国际间本领域的三大学报之一^①，只是它的出版地已经转到了亚洲。这一地点的移位在学术史上的潜在意义，我在本文的第四节中，还要谈到。

杜公的以上两大贡献与二十世纪汉学的“典范大转移”在方方面面的关涉，说来话长，无法详表。限于篇幅，此处仅聚焦于《剑桥中华文史丛刊》，以滴水观日之法，略窥杜公如何通过这一套世界级学术丛书，为“典范大转移”的进行与完成，识拔了分布在欧、美、澳、亚各洲的不止一代的年轻参与者。

据粗略统计，这套《丛刊》三十年来，出版了约五十种专书，其中作者在当时大多数都是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而他们通过自己的专书在《剑桥中华文史丛刊》中出版，脱颖而出，后来约有一半都成为出类拔萃、声名煊赫的顶尖欧美汉学家，除了本文第一节所提到的各位外，容我在这里再稍举数例，以见一斑。壮岁曾在《丛刊》中出书，如今已经荣退的大学者，可举出哥伦比亚大学毕汉思(Hans Bielenstein)、牛津大学杜德桥(Glen Dudbridge)、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侯思孟(Donald Holzman)等等，而其中年纪较轻、现在仍在国际间纵横驰骋的成名人物——如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康达维(David Knechtges)与伊沛霞(Patricia Ebrey)、宾州大学(美国“常春藤八校”之一)林霖(Arthur Waldron)与梅维恒(Victor Mair)、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施吉瑞(Jerry Schmidt)、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艾朗诺(Ronald Egan)、纽约州立大学贾志扬(John Chaffee)等等——则为数更多。此处虽限于篇幅，难以全列，然《剑桥中华文史丛刊》在为“典范大转移”培养人才方面的贡献，则可以由此略见。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以上的举例名单，完全没有包括《剑桥中华文史丛刊》当年推出、如今已成为国际级人物的华人学者。本文限于篇幅，即使只面对这样一张“不完全”的举例名单，也完全没有办法展开稍微详细的讨论，较为深入揭示《剑桥中华文史丛刊》在“典范大转移”过程中，在培养西方下一代的大学者方面所作的持续贡献。正因为如此，笔者在这里

避开上述的那张煊赫的名单,只举两个“边缘”的例子,从侧面说明《丛刊》的功能。第一个是澳洲汉学界的费思莱(Stephen Fitzgerald)的例子,讨论“海外华人”的研究议题,如何在“典范大转移”中,从“非主流”变成“主流”。另一个是华人学者黄仁宇的例子,观察在“典范大转移”中,华人学者的特殊作用与地位变迁。

二十世纪下半叶,西方的汉学大家中能参与其本国的对华政策之制定,一言九鼎,而有全世界声誉者,有两位自订的汉名都姓“费”的先生,而这两位“费”公与杜公都结下了不解之缘。第一位自然是美国费正清。第二位就是这位费思莱,此君既是七十年代初曾任驻北京大使,又曾任澳洲国立大学的远东历史系的教授暨系主任。读者也许不知道,在上世纪的澳洲国立大学中,曾有过两位享国际声誉的汉学家。一位是后来回瑞典接任斯德哥尔摩大学汉学系主任的马悦然(Nils Göran David Malmqvist),后来成为炙手可热的诺贝尔文学奖评委,六十年代则担任澳洲国立大学东方语言系主任。另一位就是费氏。这样一位名副其实的政治与学术的两栖人物,称之为南半球的“费正清”,也并不为过。

这位日后在学界和外交界春风得意的费思莱,其年轻时初出茅庐的成名作《中国与海外华人:北京1949至1970年间之政策变化研究》(*China and the Overseas Chinese: a Study of Peking's Changing Policy, 1949—1970*),就是因杜公赏识,而收入《剑桥中华文史丛刊》出版的。此书研究的是自1949年至1970年的北京的华侨政策的变迁,涉及各阶段的华侨政策的变迁和海外华人的活动史的方方面面。今天的海外华人的问题研究,不管在欧洲与北美,还是在澳洲和亚洲,都是一门很热的“显学”,但三十年前,在古代中国的研究占主导地位的汉学界,则还是“冷门”。同样,今天的澳洲国立大学是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现代中国的研究重镇,当时该校在这个领域里却还刚刚起步,费氏和后来曾出任香港大学校长的王赓武先生,就是当年在此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一代拓荒者。

回首当年,一个澳洲的学者,要在剑桥大学出版社这样的主流重镇出版一本写“海外华人”议题的学术著作,谈何容易。相对于《丛刊》的“历史、文学与制度”三大重点而言,“海外华人”研究,更是一个十分“边缘”的

题目。所幸者，杜公常敢破格，当年“出冷门”，决定把费思棻的这部处女作收入权威性的《丛刊》，推动“海外华人”研究进入主流的视野，而费氏的生涯也随之出现了一个戏剧性的转折。1972年，该书出版后，费氏旋于次年出任澳洲驻北京大使。大使卸任后，费氏重返教坛，在澳洲国立大学培养下一代的学人。他当年所主编的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是今天西方的权威刊物 *The China Journal* 的前身，至今仍南半球影响不小，而费氏《中国与海外华人：北京 1949 至 1970 年间之政策变化研究》一书对当代海外华人研究领域的开风气之先的功劳，更不可低估。

除此而外，杜公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至少还有一次大手笔的破格。该次破格的对象，事关如今已名满天下的黄仁宇的处女作《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 in Sixteenth-century Ming China*) 一书。今天黄仁宇的名字，不仅学界中人，连一般大学生和历史爱好者，都耳熟能详，达到“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的地步。

然而，读者也许不知道，黄氏当年在汉学界的崛起，有过一番苦苦挣扎的经历。《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是一本开创性的著作，以明实录、明人奏疏笔记、明代地方志等史料为基础，充分吸收了大陆、台湾以及欧美、日本的研究成果，对十六世纪中国明代的财政与税收进行了发人未发的系统分析，不仅当时是一个前沿性突破，至今仍有其学术价值。据黄仁宇在身后出版的回忆录《黄河青山》中的回忆，这本当年对他的学术前途有十分重要关系的专书出版，与费正清和杜希德两巨头都有错综复杂的关系。

当时黄氏由费正清邀请，在哈佛修改和杀青此书，本来理当由哈佛出版，然而，该书的审稿人却与黄氏的学术理念不一样，提出一系列大手术性的修改意见，在某种意义上等于要求重写。黄氏没办法接受，费正清也一筹莫展。为了打破此僵局，黄氏则将手稿转寄给剑桥杜公，希望有一线生机。杜公慧眼识英雄，见此书“预”当时“典范大转移”之“流”，当机立断，不仅将此书收入《丛刊》出版，还破例亲自作序（杜公作序，在《丛刊》近五十种专书中极少见），力挺其人，黄氏因此方一举成名。

三十多年过去了，如今黄仁宇和他的“大历史”，在其身后，如日方中，为一般知识界耳熟能详。然在当时，黄仁宇虽才华横溢，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还只是个“三等僧众”。此话一语道破了当年的华人学者中能升到汉学界顶层者的人数比例。其时，在美国第一流名校的汉学讲坛上法相庄严，讲经说法者，大多数是西人学者。虽然赵元任、杨联陞、余英时诸先生，已在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声名远播，然在整个汉学界，毕竟是少数。回到《剑桥中华文史丛刊》，总体而言《丛刊》中华人著者的比例，约只有西人著者的七分之一。

然而，如今回顾发现，在这场世纪“典范大转移”完成之后，上述七分之一的华人学者中，几乎无一“漏网”，全部都成为国际间重要的大学者：除黄仁宇外，美国还有普林斯顿大学周质平、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陈启云、Tufts 大学陈荔荔（美国国家图书奖得主），台湾则有中研院史语所黄进兴、陈弱水、王汎森。

正如前述，杜公轻易不在《丛刊》出版的书前作序一样，当年杜公还有另一条“不成文法”，为免近水楼台先得月之嫌，《剑桥中华文史丛刊》一般不出版普林斯顿的博士的著作。据我所知，杜公从 1980 年开始在普林斯顿执教近十五年间，只对两部普林斯顿博士的思想史论文，别有青眼，破例选中出版：一部是华人王汎森的《傅斯年大传》，另一部是西人葛艾儒（Ira Kasoff）的《张载的思想》。王汎森今天在学术界的成就如何，有目共睹，此处无需辞费。葛艾儒后来“投笔从戎”，跻身政界，天涯何处无芳草，年前亦已官拜美国商业部助理部长矣。

简言之，从《剑桥中华文史丛刊》在上述七人“微时”，即大胆揽其人“典范大转移”之“局”，以及葛艾儒的小小生涯花絮，都足证杜公当年的知人洞见，有运筹帷幄、决胜于数十年之外的长算。

四

以上围绕《剑桥中华文史丛刊》的出版始末，略述杜公为二十世纪欧美汉学的“典范大转移”，培养人才的点点滴滴，真所谓“千里马常有，而伯

乐不常有”。然而，顾名思义，上世纪欧美汉学的“典范大转移”，指的是西方人研究中国古典文史的学术“典范”，如何从欧洲作为“东方学”分支的“汉学”，向美国作为“区域研究”一部分的“中国研究”的方向转移。换言之，欧洲的“汉学”也罢，美国的“区域研究”也罢，研究的对象虽都是中国的学问，所采用的方法与视野，乃至学术规范和书写语言，则都是西方的产物。

众所周知，同样是研究中国的学问，在东亚还有一种与之相对应的“典范”，即中国本身“国学”的“典范”。然而，很长一个时期以来，汉学界重视的主要是西方的“典范”，所谓的“转移”，也一切都发生在西方内部，而对以“国学”为主流的东亚“典范”，则相对比较漠视。究其“漠视”的原因，相当复杂，一言难尽，然其中的一点，是西方学界认为：一方面，中文世界对汉学“典范”的奥妙，缺乏彻底的了解；另一方面，这种“典范”的奥妙，有时也很不容易用中文充分表达出来。

于是乎，无论是西人学者，还是华人学者，要在欧美本领域立足，需有相当数量的高品质英文（或其他欧洲文字）专书与论文，其品质的保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发表论文的学报与出版专书的出版社的学术严谨度。因此，《通报》、《哈佛亚洲学报》、《泰东》诸大学报，与剑桥、哈佛、普林斯顿、哥伦比亚、斯坦福等名牌大学出版社，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成为左右汉学界学术潮流的风标。这也就是为何杜公当年，凭《剑桥中国史》、《泰东》与《剑桥中华文史丛刊》三者，就能在这场欧美汉学的“典范大转移”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的部分原因。

据笔者见闻所及，二次大战前，在还是欧洲的“汉学”典范主导大局的时代，在没有西文的专书，甚至也没有完全自己写的英文论文的情况下，能被西方汉学界无保留接受的华人学者，舍陈寅恪先生，无第二人。这里的“无保留接受”的“硬”标准，是牛津的教职。陈寅恪在上世纪的前半叶，漫游柏林大学、慕尼黑大学和哈佛大学等当时西方顶尖的研究东方学的学府后，其以隋唐史为中心的学术，融会国学和汉学，已达到国际间最高境界，而牛津大学于1939年对其发出的汉学讲座教授（与美国大学的教授制不同，英国大学沿讲师制，教授则为 chair，亦即讲座教授）之聘（陈先